

尹雪曼

寫文章的

但是，仔細一想，「寫文章的」這個稱呼，不僅不錯，而且，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。認真說起來，「作家」應該是一個洋稱呼，從外國傳來的；並非我國所固有。我國對「寫文章的」傳統稱呼，大概是「文人」；所以不管是「作家」也好，「寫文章的」也好，甚至是「搖筆桿的」也好，一般說起來，在我國也都被稱作「文人」。

只是，我國社會對於「文人」的評價並不高。「文人」在我國雖屬於「士」，而這個「士」又是「士農工商」四民之首；但是，仔細分析起來，搖筆桿的「文人」似乎並不包括在這個「士」內。我國社會一般人心目中的「士」，是「士大夫」。「士大夫」雖也是「文人」，却是「做官」的「文人」；或者說是「宦場得意」

如果說我國有「寫文章的」，歷史大概十分悠久；即或不能從孔老夫子算起（孔老夫子可能沒有寫過什麼文章，他的「論語」，只是他的語錄，五經也不是他的創作）；起碼，可以從屈原算起。屈原生在春秋時代的楚宣王二十七年正月初六日（西元前三四三年），算起來，迄今已有二千三百二十年。這也就是說「寫文章」這一行，在我國已有二千三百多年的歷史，自足以使今天「寫文章的」感到自豪。

因此，這也許就是今天「寫文章的」不自稱「寫文章的」，而自稱為「作家」的原因吧。但是，今天「寫文章的」雖自稱為「作家」，背後，却仍不免被人認為和稱為「寫文章的」。有一天，我女兒從學校裏回家，一臉氣憤的對我說：「爸爸，我今天在一個同學家，她爸爸說你是『寫文章的！』」

說我是「寫文章的」，我並不覺得有什麼「難過」；只是有一點怪怪的感覺。大概是不習慣吧；被自己和別人稱慣為「作家」，如今忽然有人說你是「寫文章的」，不順耳是必然的。

的「文人」。像蘇東坡那樣「一肚皮不合時宜」的「文人」，雖是「文人」，由於在官場上未能得意，所以恐怕難以位列「士大夫」，只能算是一位「文人」罷了。

因此，一句很「功利」的，對文人的批評，便在我國社會上流傳開來。這句話是：「一爲文人，便無足觀。」而一些不太肯用大腦的人聽了這句話，也就跟着起哄，跟着嚷嚷。下意識的認爲：「寫文章的……。」不用說了。

「寫文章的」爲什麼「不用說了」，因爲三千年來，我國社會所最重視的，乃是「做官」。從前人口中唸唸有詞的兩句話：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」意思並不是說讀書可以變化一個人的氣質，增廣一個人的見聞；或進一步有所發現，從而造福社會，造福人羣。而是說讀書可以通過「文官考試」；在獲得秀才、舉人、進士的身分後；可以「做官」。「官」是我國社會上的第一等人，不僅可以光宗耀祖，而且能够擁有一切。但是如果讀書的結果，只是變成了一位「寫文章的」，那麼，有歷史爲證：屈原的文章寫得不好嗎？司馬遷的文章寫得不好嗎？陶淵明的文章寫得不好嗎？還有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、羅貫中、施耐庵、曹雪芹……這些人的文章寫得雖好，活得似乎都不够愉快。因此，說「一爲文人，便無足觀」，以能不能「做官」爲標準來看，自然要令人「心折」得無話可說。

然而，也許是老天爺故意要跟「文人」——「寫文章的」搗蛋，天底下、地頂上最不會「做官」的，便是「寫文章的」。「寫文章的」爲什麼不會「做官」？不要說從屈原開始往下數，除了宋朝的王安石以外（王安石的「官」做得雖不小，可是結果却做得唏哩嘩啦），簡直沒有一個做官做得得意的。就是東西兩洋、世界各國，似乎也找不到個把官場得意的作家。原因是，就我的淺見，恐怕由於凡屬文人、搖筆桿的、爬格子的、寫文章的，都有一個最大的毛病：「腦筋太清楚」。

「腦筋清楚」是文人搖筆桿、寫文章、爬格子的必備條件。就像古代文人的文房四寶、現代文人的原子筆和稿紙一樣，絕不可缺；起初的腦筋也許只是稍有清楚；但文章寫得愈多，腦筋清楚的程度愈高；結果，就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十分清楚了。腦筋十分清楚後，看事就不免太明白。看事太明白，毛病可就大啦。不信請看三國時代的標準文人楊修。當他老兄跟着曹操到漢中去打張繡的時候，一天曹操下了個口令「鷄肋」；他知道，就要大家趁早捲鋪蓋。有人問他為什麼？他說：丞相的口令既是鷄肋，可以想見他對打張繡的胃口不大。鷄肋者，乃是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的玩意兒。因此，足證丞相就要撤兵；不趁早捲鋪蓋還等什麼！

這事當然被曹操知道了。試想，以曹操那樣的一個奸雄，他作何感想？如果曹操的心思、曹操的一舉一動，都逃不過楊修的「法眼」，曹操還能混嗎？結果，楊修終被曹操加了一個「莫須有」的罪名宰了。這當然是古今文人最不幸、最悲哀的下場！但上焉者，也不過是像杜甫、陶淵明、施耐庵、曹雪芹等等：「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飢無儲粟。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」在這種情形下，活着比被人宰了似乎也好不到那裏去。但是這也是因為在杜、陶、施、曹時代，「爬格子」尙稱不上一種行業。因此，比今天武俠小說作者的收入可差遠了。今天的武俠小說作者會不會做官，固然少人知道；但他們個個都能賺大錢，口袋裏「麥克、麥克」，却離事實不遠。

說起那位不願（屑）「爲五斗米折腰」的大詩人陶淵明，倒真可以做文人不曾做官的註腳。我的朋友宋海屏在他的大著「中國文學史」中說：「陶潛，是屈原以下文學史上第一顆彗星。……他是東晉名將陶侃的曾孫，曾爲彭澤令……雙親早死，一弱妹，一妻，五子，一女。……薄田數畝，茅屋數間，養七孩童，亦云苦矣！」但是，「他性格

不適合做官；因為做官要圓滑，他剛直；做官要矯飾，他率直；做官要逢迎，他耿介；做官要結黨，他孤獨；做官要資本，他家貧；做官要動民，他懶散；做官要整潔，他隨便；做官要清廉，他貪酒；做官要活動，他愛靜。」

這樣的一位陶淵明，雖是他自己的畫像，也是天下文人的畫像。雖是陶淵明的毛病，也是普天下文人的毛病：不够圓滑，不會矯飾，不善逢迎，不肯結黨；缺少活動做官的資本，懶散，隨便，貪酒，愛靜。然而陶淵明的長處，也是普天下文人的長處：剛直，率直；不逢迎，不矯飾。但是這些長處，對於搖筆桿，爬格子或有不少用處；對於做官，却一無是處了。然而三千年來的我國社會，對於一個人的評價，總以「能不能做大官」、「會不會做大官」、「有沒有做大官」為標準。倘若一個人不合乎這三項標準，即令文章寫得再好，即令是屈原、陶淵明再世，也「毫無足觀」！因此，一個人一旦成為文人，在我國社會傳統的「價值」標準評判下，已經够悲哀了；倘若再被人稱之為「寫文章的」聽起來好像跟「擦地板的」、「抹桌子的」、「收垃圾的」、「掃馬路的」……差不多，雖然擦地板的，抹桌子的，在人格上並不低於任何人；但一個寫文章的，心中却不免多少還殘留著一絲兒的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潛意識。因此一旦被人戳穿，其能不啞然若失，瞠然若「醒」者，真是幾希了！

然而，「寫文章的」雖不足觀，雖不值錢；三千年來的中華民族

，依賴於寫文章者的剛直處，分析起來，却也不小。多少年來，我國社會所最不耻的歷史人物，便是最會做官的人。（這個標準跟前面所說的標準好像很矛盾；其實，並不矛盾。因為前者是時人看時人，後者是今人看古人。這種雙重標準，也是中華民族性格上的神秘處和奇妙處！）趙高、李斯不會做官嗎？曹操不會做官嗎？秦檜、嚴嵩不會做官嗎？就做官而論，趙高、李斯、曹操、秦檜都是一等的角色！然而我們後人推崇的，却偏偏是不會做官的屈原、司馬遷。有所不取，有所不爲的儒將關羽、岳飛、文天祥。是一些生前幾乎飯都吃不飽的搖筆桿的，以及有所不取，有所不爲，寧丟性命，不放棄原則的儒將。而不是那些左右逢源，「三教一桿」，飛黃騰達，不可一世的達官貴人！我國歷史上有多少宰相？有多少將軍？論數目恐怕不下於搖筆桿的吧？但是，在比例上爲後人所知、所念的宰相、將軍，却沒有文人多。如此看來，搖筆桿仍舊是不可爲而可爲；且不必洩氣吧。

王璇和他的五本書

王璇，本名王孝廉，民國三十一年生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。廣島大學文學研究科碩士，現正繼續攻讀博士中，著有「廣陵散記」（地平線出版社）、「橘屋的書」（幼獅文化公司）、「長缺短歌」（大漢出版社）、「中國的神話與傳說」（聯經出版公司）並譯有「中國古代神話研究」（森安太郎原著）。王璇的隨筆充滿了對人的關懷與同情，最難得的是，讀他的書，我們感覺到一顆熱血滾滾的心。